



▶ 技术简报第三期

2021 年 3 月

▶ 关于平台经济从业人员就业和社保覆盖监测的国际实践与标准： 对中国调研的启示

要点

由于在涉及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数量、特征和条件方面缺乏一致稳健的统计数据，近期针对新就业形态的循证决策受到制约。本技术简报介绍了欧盟国家在为监测平台经济从业人员就业和社保状况采取的国家政策上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同时论述当前国际上为协调不同方法所做的工作。最后，简报参照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采用的方法论对中国平台就业人员进行调查，并在结语部分表明该方法合理推动了中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国家监测框架。

引言	4
为什么监测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就业和社保状况？	4
关于数字平台就业的数据采集方法	7
传统的统计调查	8
劳动力调查和家庭收入及预算调查	8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调查	11
从抽样调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12
针对性调查	13
通过平台公司开展调查	13
在线调查	14
部分针对性调查	15
从针对性调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16
管理数据	17
替代源和大数据	18
为什么对新就业形态和平台经济的测量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18
在劳科院“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2020-2021）中融入良好实践调查	20

“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对建立关于非标就业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监测框架的贡献.....	22
总结与结论.....	26
作者与致谢.....	27
附录.....	31
附录 1：术语表.....	31
附录 2：关键人物访谈.....	32
附录 3：表格：以调查为 DPE 测量工具.....	32

表

表 1 中国劳动力调查关于平台就业的问题.....	8
表 2 瑞士劳动力调查为识别平台从业人员设计的问题.....	9
表 3 美国临时工补充调查为识别平台从业人员设计的问题.....	10
表 4 不同基准期产生的平台型工作预测结果差异.....	11
表 5 欧洲统计局关于 ICT 适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表范本中涉及 DPE 的问题.....	11
表 6 所选调查中向调查对象解释 DPE 概念的几种做法.....	12
表 7 社会保障绩效指标.....	22
表 8 监测框架基本绩效指标及相关数据来源.....	24
表 9 数据收集策略概览.....	26
表 10 相关概念术语表.....	31
表 11 关键人物访谈列表.....	32
表 12 全国抽样调查中使用的测量方法概览.....	32
表 13 用于在所选标准劳动力调查和家庭调查问卷中识别非标准形态就业、工作条件和社保覆盖情况的变量.....	33

缩略语列表

AMT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网

BLS 劳工统计局（美国）

DPE 数字平台就业

ICLS	国际统计学家大会
ICT	信息和通讯技术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LFS	劳动力调查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LI	线上劳工指数

引言

由于与数字平台从业人员数量、社会经济特征和工作条件相关的统计数据缺乏一致性、稳健性和可比性，目前针对新就业形态展开的循证决策受到阻碍。例如在 2016 和 201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查了 40 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测度实际情况，结果发现大多数国家在该领域的进展缓慢或没有将其作为国家统计数据中的重点（IMF 2018）。

本篇统计综述是“以平台从业人员、农民工和女性为侧重，评估中国对非标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覆盖以及缩小覆盖差距、提升社会保障待遇可转移性的措施”研究项目的部分内容，本项目受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委托，并由欧盟提供资金支持。2020 年 9 月至 11 月，项目成员赴浙江、四川和广东三省与负责社保工作的地方政府官员共同展开实地访谈。访谈会议中指出，对于非标准就业形态（NSFE）和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就业及社保覆盖情况，目前仍缺乏协助政策制订的管理数据和具备可比性的调查数据。

本技术简报旨在为人社部和中国省级政府官员就建立一种 NSFE 与数字平台从业（DPE）人员就业及社保状况通用监测框架提供建议，进而协助政策制定。ILO¹认为非标准就业形态是对偏离标准就业的不同就业安排的总称，包括临时就业、兼职工作和随传随到性工作、中介临时工和其他涉及多方雇佣关系的工作，以及变相就业和依赖性自雇就业。非标准就业的主要特征在于数字劳工平台，其中工作依托线上平台和实地平台两种媒介。因此，平台就业人员通过应用软件或网站进行个人和客户的匹配，从而提供服务换取报酬，服务范围涵盖运输、编码、产品说明撰写等多种类型（见附录 1 术语表）。

本文第一节分析监测框架在落实国际劳工标准（ILS）中发挥的重要意义，以及在不考虑雇佣状态的情况下对所有工人就业和社保状况的监测重点；另外还阐述了欧盟对此采取的方法。本文第二节，即文章的主体部分对不同方法论——用于对 NSFE 和 DPE 从业人员的数量、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保覆盖质量进行数据采集和统计——对优势和劣势作出了简要综述。本节分析方法论设计中出现的取舍协调和良好实践，并建议综合多种方法搭建国家监测框架。最后两节讨论如何在中国即将开展的针对性调查中吸取相关经验教训，并就在中国建立评估 NSFE 和 DPE 从业人员就业和社保状况的监测框架给出建议。

为什么监测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就业和社保状况？

社保监测与评估框架为决策制定者实施社保政策及相关战略提供指导，通过阐明制度安排和数据来源提供信息并追踪战略实施进展。国际社会保障标准表明，监测是逐步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关键。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政府有责任对社会保障权的实现过程进行进展监测，且应当通过明确影响职责开展的因素和困难继续推动监测实施（CESCR 一般性意见 19，第 39 条）²。ILO 在《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

¹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non-standard-employment/lang--en/index.htm>

² <https://socialprotection-human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CESCR-General-Comment-19.pdf>

(2012, 第 202 号)³中鼓励各国由国家通过的适当机制监测在实现国家社会保障扩展战略目标中取得的进展。为此,各国需定期采集、汇编、分析并发布适当范围的社会保障数据、统计结果和指标,尤其是在按性别分列的情况下(第 3, 19, 21 款)(ILO 2017, ILO 2019)。

当前非标准就业形态(NSFE),尤其是数字经济平台(DPE)就业发展迅猛,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速增长⁴。迄今证据表明弱势工作者,特别是自雇人员和 DPE 从业人员在疫情危机中首当其冲(ILO 2020 & OECD 2020)⁵。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逐步向在过去几十年中未被纳入覆盖的群体提供社会保护并加速扩大该群体参保覆盖面⁶,结果喜忧参半。由于 NSFE 中的工作多以活动和任务为导向,工作期限较短且工作更换频率较高,因此对 NSFE,特别是 DPE 从业人员的界定比其他工作者更加困难。这些特性赋予 NSFE(尤其是 DPE)一种“隐藏”属性,例如传统的统计工具无法充分捕获这类工作者的入口、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特征。ILO 在 2020 年普查“在不断变化的前景中促进就业和体面工作”中指出“模糊隐蔽的雇佣关系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数量、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整体经济和社会政策”。

ILO 和欧盟政策强调需向所有工人提供充足有效的社会保护,不论他们的就业状态如何。例如《社会保障底线建议书》第 6 条中指出成员国至少应向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居民和儿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担保。第 15 条指出社会保障扩展战略应同时适用于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工作者。同样,欧盟委员会在 2019 年 8 月通过的关于向工人和自雇人员⁷提供社会保护的《建议书》(2019/C 387/01)中强调,确保“所有工人,不论雇佣关系类型,和自雇人员”均获得有效覆盖(EU 2019,第 9 条)。然而,ILO 和欧盟认识到社会保障体系最初是为持有“标准雇佣关系”的工人建立——这之间隐含了一种长期的全职工作关系,可能会导致其他群体的覆盖面缩小。因此,它们一致认为如果将 NSFE 和 DPE 从业人员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可能需适应现行法规或经办管理流程⁸。(EU 2019 & ILO 2020)。

由此,监测 NSFE 从业人员的就业及社会保障状况是测量现行政策工具的效力和效能,并继续寻求方法以完善政策设计和实施的关键。ILO《雇佣关系建议书》(第 198 号)第三部分重点提出建立一种监督劳动力市场动态的机制,建议应在国家政策中设立一个适当的制度框架,或利用一个现有框架对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组织的动态进行监督审查,并为采取和落实涉及雇佣关系的措施拟定咨询意见(第 19 款)。例如在丹麦,政府、社会伙伴和青年代表共同设立了改革理事会,以考察更加灵活的就业方式并对自雇人员和临时工的社保待遇作出审查(ILO 2020:145)。

³在扩大社会保障的战略之内向成员国提供实施社会保护底线的指导,逐步并最大限度地确保民众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⁴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what-have-platforms-done-to-protect-workers-during-the-coronavirus-covid-19-crisis-9d1c7aa2/#section-d1e187>

⁵ 同上。

⁶ 同上。

⁷对“工人”的定义随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异,ILO 认为“自雇人员”属于工人,欧盟建议书则倾向于将二者区别定义: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H1115%2801%29>

⁸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Emodule.action?id=61>



预计 2021 年中国共享经济增速将 10-15%。2020 年中国平台经济中的服务提供者和员工分别达到 8400 万和 631 万人，疫情期间，直播电商/培训/教育和在线医疗服务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

信息来源：《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图片来源: 123RF.com

监测平台从业人员的人口和就业特征具有多方面益处，例如帮助理解该类型劳动人口的异质性，同时政策制定者得以捕捉其工作模式的量变和质变，进而预测对社保政策设计和实施的调整需求。

监测有助于对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例如 DPE 从业人员正趋于年轻化还是年长化？以男性还是女性居多？从业人员是否有子女？教育水平较高还是较低？根据欧盟 2017 和 2018 年协同经济调查（COLLEEM）得到的纵向数据，年轻女性平台从业人员的比例逐年增长。

COLLEEM 等纵向调查同样有助于了解新增平台从业人员中是否始终包含同一个体，又或 DPE 是否作为从事其他就业形式的跳板。此外，数字平台经济中包含多种收入水平，因此有必要评估因从事此类活而陷落入贫困的人口，或面临陷入极度或相对贫困的风险；反之，DPE 也可能为家庭带来重要的收入补充。就社保政策而言，了解特定风险的分散状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DPE 面临哪些主要风险？存在哪些重点需求？由此引发的更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比如这些风险是否会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或工作环境压力的增大而发生改变？此外，我们还需能将平台从业人员发生任何特定风险的几率与社保参与度相关联，进而可以了解社保缺失或参保对工人收入的影响，比如按风险类型和性别对其划分。

因此，国家社会保障战略和计划需要稳健实时的数据支持。与之相似，国际社会追踪全球社会保护进展的能力有赖于国家统计系统提供相关数据的能力。可持续发展（SDG）目标第 1.3 项即是“执行适合本国国情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最低标准，到 2030 年在较大程度上覆盖穷人和弱势群体”。SDG 目标受 ILO 监管并以指标 1.3.1 为衡量标准，即“社会保护底线/体系覆盖的人口比例，按性别分列并区分儿童、失业人员、老年人、残疾人、孕妇、新生儿、工伤受害者、穷人和弱势者”。另一项重要目标——SDG 目标 3 旨在“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具体目标 3.8⁹指出“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金融风险保护，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可负担的基本药品和疫苗”，各国负责向联合国汇报上述指标进展的国家主管机关需设立稳健详细的监测体系¹⁰。

⁹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3&Target=3.8>

¹⁰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w4sd/themes/sp-floor/WCMS_560732/lang--en/index.htm

欧盟率先提出针对所有工人和自雇人员设立社会保护跨国监测框架。欧洲理事会采取了欧盟委员会关于提供社会保护的建议书（2019）中的内容¹¹，建议成员国确保所有工人和自雇人员可以参与社会保障计划（弥合与正规工作者的覆盖差距），逐步建立可保留、可累积或可以在不同计划间转移的权益（提升有效覆盖面），领取充足且实时的待遇并适当缴费（充足性），以及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透明性）。2020 年，欧洲社会保护委员会指标小组（ISG）对监测框架 0 版本展开试点¹²，该版本框架将对目标实现过程中取得的进展进行追踪；2021 年，完善过后的劳动力调查将能够抓取更加多元的就业状态，并对临时性就业或依赖性自雇就业等就业类型的普遍程度作出测量，同时保持工作投入以更好掌握平台型就业。

欧盟社会保护委员会现已研发出一种监测工具，可用于识别欧盟关注的年度重点社会趋势。该监测工具的仪表板包含多项指标，指标列表请访问：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employment-and-social-inclusion-indicators/social-protection-and-inclusion/sppm>

选用这些指标的原因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关系参见：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7cc15f72-ec38-11e6-ad7c-01aa75ed71a1>

关于数字平台就业的数据采集方法

统计部门和研究人员在采集 NSFE 与 DPE 相关数据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信息汇集渠道包括：

- 对某一类人口的抽样调查，该调查可识别平台雇员（综合运用多种 DPE 识别形式）。
- 线上开展的针对性和部分针对性调查，可能由数字平台自身进行
- 政府或平台采集的管理数据
- 可替代数据源，如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调查和网络抓取（网络收集或网络数据提取）

恰当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目标、信息资源和研究人员面临的取舍。

例如传统的调查方法适用于测量数字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与其收入结构，同时有助于提供不同国家的对比统计数据。同样，以调整后的劳动力调查统计数据衡量 NSFE 和 DPE 将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关注的焦点，即调查比较所有工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不论其就业状态如何。全国抽样调查中包含与 NSFE 和 DPE 相关的问题或特定模块，该调查一年开展数次并能高效监测 NSFE 和 DPE 所有从业人员的就业及社会保障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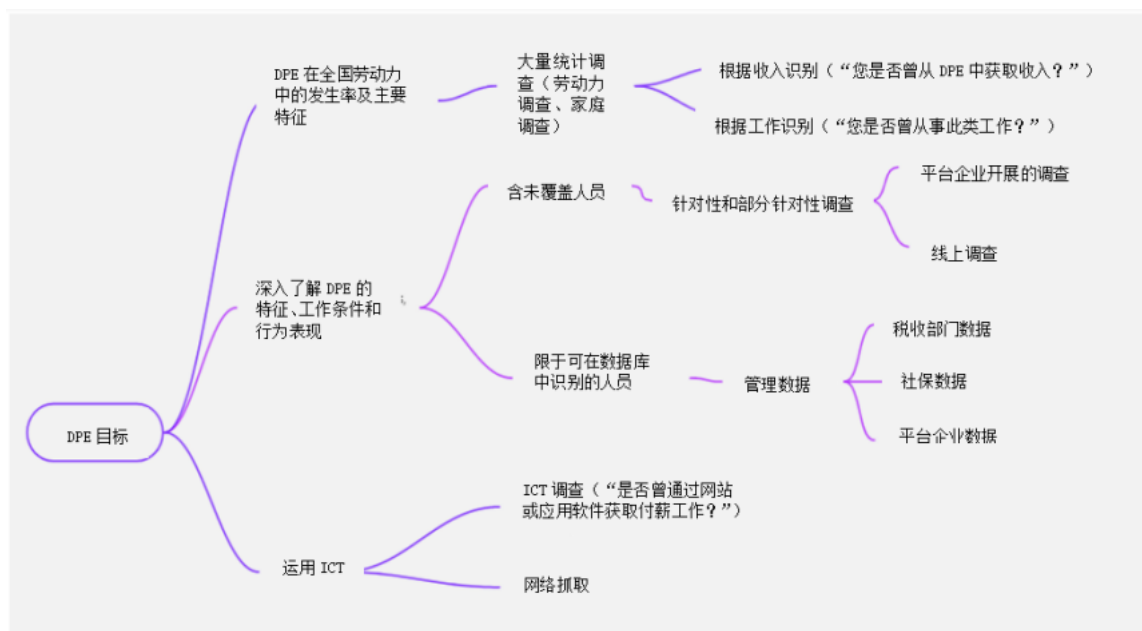
然而，由于这些调查并不特意针对非标准就业形态和数字平台就业展开，因此可能出现数据颗粒度较差的问题。尽管针对 DPE 的调查抽样有限，但相较传统的统计方法它们可以提供更多深层信息，例如从业人员对平台收入的依赖程度、工作习惯、工作条件和福利。

接下来的几节介绍此类数据的采集策略、国际案例及相应汲取的经验教训。

¹¹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478&furtherNews=yes>

¹²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38&langId=en&pubId=8363&furtherPubs=yes>

图 1 对 NSEF 和 DPE 工作的数据采集方法



传统的统计调查

劳动力调查和家庭收入及预算调查

传统的可用于识别 DPE 的抽样调查包括国家劳动力调查和家庭收入及预算调查。受上述调查的结构影响，只有当明确问及关于平台型工作或平台收入的问题时才可能识别出 DPE。劳动力调查中设置的标准问题（如附录所示）通常可以通过工作关系特征（如合同类型和工时）的认定识别 NSFE 或自雇就业，因而照此无法对 DPE 进行区分。此外，如果调查对象不将自己的平台活动视为就业（例如调查对象仅提供临时服务或将其作为本职以外的工作），那么调查将把他们归为无工作人员，同时与就业相关的问题将被跳过。最后，如果劳动力调查设置的基准期较短，则可能不会将间歇性就业算入其中，但在连续性调查中该问题相对较少。

至此，仅少数国家（加拿大、中国、丹麦、芬兰和美国）在调查中设计了关于数字平台就业的具体问题（见附录中的概述），大多数国家则在原有劳动力调查中临时增添与替代性就业形式（含 DPE）相关的模块（Tinonin 即将出版）。仅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主要调查问卷中设置反复出现的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在网上发布了调查问卷¹³，其中与平台就业相关的问题摘录如下：

表 1 中国劳动力调查关于平台就业的问题

27.您是否有通过互联网承接的业务（本人承接业务）？

① 是

¹³第 9 页（问题）；第 29 页（解释说明）：http://www.stats.gov.cn/tjsj/tjzd/gjtjzd/202006/t20200619_1769484.html

② 否→问题 28

27.1 主要从事以下哪一类？

- a. 承接生产订单（如实物生产、软件编程）
- b. 商品交易（如微商、淘宝）
- c. 金融服务（如互联网小额贷款、互联网保险代理）
- d. 用车服务（如快车、专车、代驾）
- e. 物流服务（如送外卖、快递、货运、跑腿、代办）
- f. 生活服务（如餐饮、家政、家庭旅馆、农家乐）
- g. 知识、技能、娱乐、广告等服务（如网络教育、医疗、咨询、网络编辑、网络维护）
- h. 其他（请注明）

信息来源: 中国劳动力调查, 2020

在劳动力调查中统计部门主要采用两种¹⁴测定工作（包括数字平台就业）的方法：基于收入和基于工作的统计法¹⁵。基于收入的统计法即询问基准期内调查对象是否从 DPE 中获得收入，用该方法识别平台从业人员一般需要长达 12 个月的基准期，示例如下：

表 2 瑞士劳动力调查为识别平台从业人员设计的问题

问题	回答
网络平台和应用软件为创造新收入提供了可能，您通过平台与客户联系且通常直接从平台获取报酬。	1 是 2 否
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通过爱彼迎（Airbnb）或 Flipkey 等网络平台向他人出租房间、公寓或住房？	8 不清楚 9 不适用
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通过 Uber 或 Lyft 等网络平台或应用软件提供出租车服务？	1 是 2 否 8 不清楚 9 不适用

¹⁴第三种基于工作位置的方法出现在 Tinonin（即将出版）的研究中，但经过与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商讨，作者认为该方法无法将 DPE 数字工人与远程办公人员和居家工作的自雇人员，因此迄今为止仍未获得统计学家的支持。

¹⁵与 ILO 统计部展开的关键人物访谈

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通过网络平台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例如保洁、手工制作、送货服务或在线编程？	1 是
	2 否
	8 不清楚
	9 不适用
通过网络平台或应用软件提供服务获取的报酬在您的收入中占多少份额？	比例为 %
	998 不清楚
	999 无答案

信息来源：瑞士劳动力调查问卷（2019）¹⁶

基于职业的统计法将DPE概念化为一种就业形态，询问基准期内调查对象是否参与此类工作。美国当前人口调查中的临时工补充调查采取的基准期较短，仅为一周。基准期较长会导致DPE预估从业人数中间歇性平台从业人员的比重增加，但因时间较久调查对象可能难以记起期间经历，统计结果恐无法做到完善有力。由于在基于职业的统计法中所设计的问题通常是关于调查对象主要及次要就业形式的细节（至少适用于DPE为首要或次要工作的观测）。美国临时工补充调查采用基于职业的统计法，相关内容如下：

表 3 美国临时工补充调查为识别平台从业人员设计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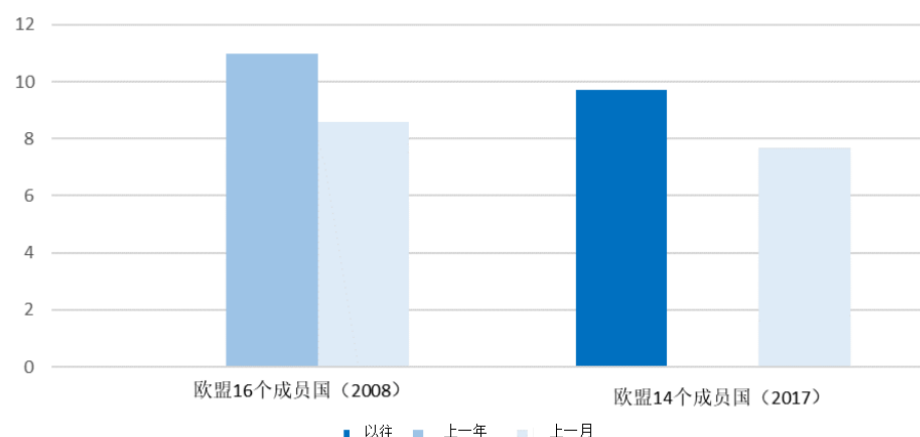
问题	回答
部分人员通过在应用软件或网站上发布的仍然有效的企业列表承接短期线上任务或项目，任务执行全部线上完成并由企业协调工作付款，例如数据录入、文本翻译、网页或软件开发、图形设计等。	1 Yes 是
（您/姓名）上周是否从事任何符合以上描述的工作？	2 No 否
这是（您/姓名）的（工作/（主要工作,第二职业））还是（其他）为赚钱承接的额外工作？	1 主要工作
	2 第二职业
	3 其他

信息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

基准期不同导致对 DPE 的预测结果出现差异（表 4）

¹⁶ Available at: <https://www.bfs.admin.ch/bfs/en/home/statistics/work-income/surveys/slfs.assetdetail.8467225.html>

表 4 不同基准期产生的平台型工作预测结果差异



信息来源：Pesole 等（2018），Urzi Brancati, Pesole & Fernández Macías（2020），ILO（2021:49）

尽管在现行研究中另加入所需模块降低了成本且劳动力调查的样本容量往往非常庞大，但至少从欧盟的情况来看，像平台从业人员这类极小众群体的具体特征仍将缺乏统计精度。

根据关键人物访谈，欧洲统计局（欧盟委员会的统计主管机构）正计划在欧盟劳动力调查（EU-LFS）中临时新增一项 DPE 模块。该模块目前正由专责小组负责研发，预计将于 2020/21 年在部分成员国投入测试。

欧盟统计局计划在其调查问卷中综合运用基于工作和收入的统计方法，表示两种方法可以进行有效互补。由于 DPE 具有灵活性，工人可以动态加入或退出平台，因而根据基于收入的统计法中较长的基准期，即使是未在上一年连续使用平台的工人也将被识别为 DPE 从业人员；而作为补充，基于工作的统计法将提供基准周内承接 DPE 工作的人员信息。因此，两种方法的结合有助于将从事 DPE 工作的频率与一般就业信息相关联，同时连接与工人的主要工作和/或第二职业相关的信息。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调查

ILO 在整理各国为测定 DPE 采取的国家战略时发现，在欧盟，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是此类信息的第二大来源（Tinonin，即将出版）。根据相应的案头审查，现已有 10 个成员国采用欧洲统计局关于“2014-2019 年家庭及个人对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使用情况”问卷调查表范本，包括丹麦、芬兰、德国、希腊、荷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典。这些调查就技术和网络在人口中的接入及使用情况进行了估测，与 DPE 相关的两项问题如下（欧洲统计局，2019）：

表 5 欧洲统计局关于 ICT 适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表范本中涉及 DPE 的问题

问题	回答
过去 12 个月您是否通过中介网站或应用软件（如“跑腿兔”、“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等网站）获得付薪工作？（职业介绍网站的网站除外）	1 是 2 否

如果“是”：您能否明确该工作属于：

☐
☐

a) 主要收入来源

b) 额外收入来源

信息来源：欧洲统计局（2019）：欧洲统计局对家庭和个人 ICT 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表范本

在 ICT 调查中加入上述问题可证明有助于预测 DPE 发生率，并能与劳动力调查及行政管理资料得出的预测结果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然而，由于这些调查的侧重点不在就业本身，它们对工人特征及条件状况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

从抽样调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劳动力调查和对人口的 ICT 使用情况调查为掌握数字平台就业（DPE）的发生率提供了有效信息，但在创建稳健且可比较的 DPE 信息方面仍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

首先，对 DPE 含义的理解是统计学家和调查对象共同面临的难题，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经历即是证明：许多调查对象不清楚问卷中“数字平台就业”的含义，导致过度报告的案例极高；去掉明显的假性肯定¹⁷回复后预期参与数字平台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将从 3.3% 下降至 1%（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调查实施之前通过潜在的调查对象测试问题的可理解性和作答性称为认知测试，该测试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问卷成功率但不能保障最终结果。例如劳工统计局在正式的实地调查前进行了两轮认知测试，但在调查实施后仍表示问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援引国内知名公司的名称可能有助于调查对象理解数字平台就业的含义，如兰德-普林斯顿美国生活调查小组（Katz & Krueger 2019）、芬兰劳动力调查（芬兰统计局，2018），或欧洲统计局关于家庭和个人 ICT 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表范本¹⁸中的做法。然而正如美国劳工局（2018）指出的那样，援引特定的平台名称可能导致不在问题之列的公司员工漏报信息。

表 6 所选调查中向调查对象解释 DPE 概念的几种做法

调查	问题	回答
美国劳工局当前人口调查（2017）	部分人员通过在应用软件或网站上发布的仍然有效的企业列表承接短期线上任务或项目，任务执行全部线上完成并由企业协调工作付款，例如数据录入、文本翻译、网页或软件开发、图形设计等。	1 是 2 否 3 不清楚
美国生活调查小组（2018）	您上周开展的零工、HITS 或其他付薪工作中是否有通过线上应用软件承接的工作，例如“跑腿兔”或“优步”？	1 是 2 否

¹⁷ 例如理发师和警察报告称完全通过线上平台型工作

¹⁸ 问卷调查表范本详情请访问：<https://circabc.europa.eu/faces/jsp/extension/wai/navigation/container.jsp>

欧洲统计局关于家庭和个人 ICT 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表模板 (2019)	过去 12 个月您是否通过中介网站或应用软件 (如“跑腿兔”、“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等网站) 获得付薪工作? (职业介绍所的网站除外)	1 是 2 否
芬兰劳动力调查 (2017)	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通过以下平台型工作或从中赚取收入?	1 爱彼迎 2 优步 3 Tori.fi/Huuto.net 4 已解决 5 其他平台 6 以上均无
德国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调查小组 (2020)	互联网提供了多种无需雇佣即能赚取收入或补充收入的机会, 例如在某网站或应用软件上销售商品、出租或提供服务。 自 2019 年 1 月起您是否使用应用软件: Q105 销售商品 (二手/新货/自制)? Q109 出租 (房间, 地产或汽车)? Q113 提供服务 (维修, 手工制作, 编辑或编程)。	1 是 2 否

信息来源: 见左列标注的调查问卷

O'Farrell 和 Montagnier (2020) 的研究以及关键人物访谈中均指出, 样本容量的问题阻碍了调查提供该类人群的详细信息。由于 DPE 工作者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较小, 调查样本的观测例数自然也随之较低 (样本庞大的劳动力调查也不例外), 从而导致关于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特征和工作条件 (包括获取的社会保障) 的描述性统计可信度有限。

针对性调查

近年来学术机构、国际组织和专家小组对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特征和工作条件的关注激增。由于传统的抽样调查方法存在多方面局限, 研究人员逐渐采取 a) 直接通过平台公司或 b) 在其他线上渠道发问卷的方式对平台从业人员展开针对性调查。

通过平台公司开展调查

2015 年 ILO 针对两家主要的劳工平台——CrowdFlower 和 Amazon Mechanical Turk (AMT) 进行了首个众包调查 (Berg, 2016)。调查以任务的形式在平台发布, 共分两轮且每轮过后分别付给调查对象 1 美

元和 3 美元的报酬，最终共有来自美国和印度的 1,167 名工人参与调查¹⁹。除了人口信息和标准劳动力调查中的问题，ILO 还在此次调查中询问了工人的收入保障和社保获取情况，以及平台的优点和可以完善的地方。调查结果强调了在衡量（以及概念化）DPE 从业人员社会保护方面面临的一项挑战：以数字平台型工作为主要职业的工人和在从事数字平台型工作的同时具备标准就业的工人在社会保护覆盖面上存在巨大差异。以平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社保稳定性较差，其中向社保基金缴费的人员比例仅为 9.4%，而在同时从事另一份工作的工人中该比例达到 77%（Berg 2016）。该调查为衡量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社会保护带来启示：纳入覆盖并不一定意味着从 DPE 中获得社会保障，也可能是出自其它活动；或许对问题的设计必须更加深入，以明确缴费出自哪种收入来源。2017 年 Berg 和 Rani 再次实施了 ILO 的众包调查，此次调查的样本容量大于之前（N=3,345），覆盖了更多就业平台（AMT, Crowdfunder, Prolific, Clickworker, Microworkers）并有来自更多国家的工人参与。

2020 年 ILO 向 100 个国家的 12,000 名工人、70 家传统公司、16 家平台公司和 14 家平台工人协会展开调查——形成迄今为止关于 DPE 最全面的报告（ILO, 2021）²⁰。本次调查采取了多种方式的抽样和调查对象征集，包括借助线上应用软件和传统的线下调查。如 ILO 此前在采集数字平台从业人员数据时的做法，调查询问了人口特征、工作条件和社保获取情况，并采取了定性和定量问题相结合的方式。报告揭示了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对全球工作造成影响。尽管 2020 年数字平台的劳动供给急剧攀升，但需求出现下降并向与软件开发和技术有关的任务转变。平台过量的劳动供给已引发工人间的竞争，在为任务“一争到底”的情况下这进一步加剧了工资下滑。

Hall 和 Krueger（2017）对美国 600 余名优步司机进行了调查²¹，并将调查数据与平台对司机的匿名管理记录相结合。该调查通过优步应用软件展开，旨在了解司机特征以及与公司合作的动因，同时将他们的人口特征与从其他抽样调查中获得的其他工人的特征进行比对。

ILO 对中国三大数字劳工平台的从业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J. P. Chen 2020）。符合资格要求的工人（年满 18 岁且在平台上的注册时间不低于 3 个月）可领取任务，填写发布在三个平台上的调查，问卷完成后可获得 20 元（约合 2.8 美元）奖励。

根据 ILO（2021:51），一般定义和方法论方法的以及部分平台的不透明对预测经由数字劳工平台获得工作的工人数量造成阻碍，因此呼吁数字劳工平台实现透明管理并披露通过平台就业的人员数量

在线调查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劳科院）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调查对象招募策略。2019 年劳科院在中国主要的问卷平台“问卷星”上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调查共发出 2,148 份问卷，发放对象包括 5 类平台从业人员：平台公司员工，被派遣执行平台型工作的第三方机构员工（如线上网约车司机、快递员

¹⁹ 例如工作时间、主要或第二职业等。

²⁰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21/WCMS_771749/lang--en/index.htm

²¹ 该调查由 Benson 调查组展开，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bsgco.com/uber>

等），个人平台店主，个人平台店员以及其他平台从业人员（例如微信公众号运营商、网络主播等）

²²。

另一项研究（Liu & Chen 2020）以线上招募与访谈和传统的滚雪球式招募与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三座城市（北京、杭州和成都）的四类数字平台雇员（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和电商工作者）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调查²³，时间为 2018 年 7 月至 9 月。由于大多数平台从业人员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随机抽样法难以实施，因此调查通过电话或在线下单的方式招募调查对象并向他们解释研究目的。最先同意填写调查问卷的 12 人（每个城市中一种职业选择一人）成为首批调查对象，之后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旨在了解调查对象获得的不同社会保护水平。研究在每座城市针对每种数字平台职业选取了 30 名受访者，共计 360 人，其中 344 人以面对面对面的方式完成问卷，16 人为方便起见在线完成问卷。

ILO 提交的另一份报告同样采取了在线调查结合滚雪球式方法。Aleksynska, Bastrakova 和 Kharchenko（2018）通过三种策略招募到乌克兰的数字平台从业人员：a）在乌克兰的三大主要线上劳工平台（Kabanchik.ua, Freelancehunt.ua 和 Upwork.com 乌克兰分公司）和以风格针对自由职业者的脸书小组发布在线调查；b）从 InPoll 的互联网用户名录选择参与者；c）滚雪球策略（受访者将该调查推荐给潜在的调查对象）。调查最终留有 1,009 份观测例数，调查问卷是根据 ILO 众包调查改编的乌克兰版众包调查。

部分针对性调查

其他调查在关注数字经济的同时还旨在覆盖本国至少处于劳动年龄的互联网用户，因此调查形式介于传统的大规模调查与针对性调查之间。典型案例如 COLLEEM 调查——由欧洲理事会执行的一项关于扩大所有就业类型人员社会保护的行为调查，以及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会（CIPD）开展的零工经济调查，二者均采取了大规模在线调查的形式，但同时设定了收集数字经济（包括但不限于 DPE）信息的具体目标。

欧盟开展的 COLLEEM 调查旨在填补数字平台就业在发生率和就业特征上的数据缺口（Pesole et al. 2018）。调查样本取自 14 个成员国在市场上可售的互联网用户清单并在 2017 年收集了超 32,389 名调查对象的信息（Brancati 等 2019; Pesole 等. 2018）COLLEEM 调查以基于收入的统计法筛选平台就业人员，不设固定的基准期（您是否曾...）并对可通过应用软件开展的不同活动进行了区分。尽管问卷列出了销售、货物租赁、地产出租等一系列活动，但在分析中仅将那些提供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和执行任务的工作视为数字平台就业（Tinonin，即将出版）。

²²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9026.pdf

²³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0736995_The_disembedded_digital_economy_Social_protection_for_new_economy_employment_in_China/link/5e9eafd6a6fdcca7892beb70/download

为更好识别非标就业人员，该研究采用了非比例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并特意对比了失业人员、标准就业人员和非标就业人员（包括数字平台就业及自雇人员）获得的社会保护的差异。调查收集了来自 10 个欧盟国家的 8,000 名受访人员信息，设计的问题包括对社会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在职业选择与获得社会保护之间的抉择等。调查结果表明，与同龄人相比，年轻群体和非标就业人员获得的社会保护相对不利。2018 年第二次 COLLEEM 调查（Urzi Brancati, M.C., Pesole, A., Fernández-Macías, E. 2020）共收到 38,022 份调查反馈，调查对象为 16 个欧盟国家的 16-74 岁互联网用户。COLLEEM II 中加入了纵向量，可以此分析个人进出平台型工作的转变。调查着重关注 2017 年从事平台型工作并在 2018 年再次接受采访的人员，结果发现其中有 41.4% 的人仍作为平台从业人员，58.6% 的人已经退出；高退出率表明许多人可能仅仅在尝试平台就业，但发现报酬有限，不足以作为一种长期工作。此外，在对纵向子样本做进一步挖掘后调查发现运输服务中介平台的人员变更率高于提供专业在线服务或微型工程的平台。

CIPD（一家位于英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全国成年劳动人口抽样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为了克服传统抽样调查中有关上文讨论的样本容量的局限，CIPD 扩大了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对应的样本容量²⁴（CIPD 2017），由此可对数字平台就业的特征和评估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此外，该调查采用基于工作的统计法识别平台从业人员。

从针对性调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针对性调查（尤其是线上针对性调查）比传统的抽样调查具有更多优势，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 DPE 从业人员的状况和特征，同时解决了因 DPE 从业人员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太小导致的样本容量问题。借助众包人员使用的平台与其进行接触同样方便有效并能提高成本和时间效率²⁵。选用大众熟知的平台有助于募集大量的潜在调查对象，例如预计研究人员每月可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平台上接触到 10 万名处于活跃状态的工人（Difallah, Filatova, & Ipeirotis 2018），因此，难怪其他研究以 AMT 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并设定了不同目标，如阐释工人的人口结构（Difallah, Filatova, & Ipeirotis 2018; Ipeirotis 2010），分析劳动关系（Irani 2015），了解工人的工作动机（Gupta 等, 2014）或测量工作满意度（Brawley & Pury 2016）。

但另一方面，针对性调查（尤其是通过平台或其他在线方式开展的针对性调查）也有其挑战。它们既没有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抽样也无法对数字平台就业人员进行随机采样，此类调查存在双层选择偏差：首先，只有属于调查所选平台上的从业人员才能被纳入样本；其次，某些子样本中的从业人员可能承接的多少是短期非专业性任务，比如完成研究调研。针对上述偏差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Aleksynska 等人（2018）警告称，由于高薪酬工人参与调查的倾向较小，因此应将预测结果作为一种收入下限。但 COLLEEM 的调查发现与之相反：（报告）作者认为调查偏重表现高频互联网用户的信息且对专职（因此有更多特权）平台从业人员过度采样（Brancati, Pesole, Fernández-Macías, 2020:6）。尽管调查通过线上开展，但使用互联网是从事平台型工作的必备前提，因此报告作者认为在线调查合情合理。在报告成

²⁴ CIPD 使用了“零工经济”一词，但他们将其概念化为数字平台员工，除了那些仅使用平台来出售商品或出租其财产的人。

²⁵ 与 ILO 高级经济学专家访谈

年人口整体的调查结果时，可以根据教育、就业状态和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权重对潜在的自选择偏差作出纠正（根据欧洲统计局劳动力调查和 ICT 调查）。然而，作者发现答案的可靠性和线上调查对象的质量不总能尽如人意（Brancati, Pesole, Fernández-Macías, 2020:6）。

ILO 众包调查的经历（Berg 2016; Berg & Rani 2018）揭示了问卷作答质量²⁶容易出现的难题。首先，如果调查对象无法掌控自身环境，则其对问卷的关注可能因此受到制约甚至使用机器人完成作答。Berg 和 Rani（2018）介绍了几种测试受访对象是否重视调查的方法，以此表现作答质量。测试问题的正确答案对专心作答的调查对象来说显而易见，检测到回答错误的观测结果则从样本中删除。调查对象可以从问卷中选出自己了解或曾工作过的平台，Chen（即将出版）通过在其中加入虚假的数字平台检测受访者是否认真完成问卷。其次，有偿调查可能会诱使同一名工人填写多次问卷。在 ILO 众包调查中，邮箱地址、所用浏览器、人口数据和答复内容表现出的相似性是鉴别重复提交结果的受访者的依据。Aleksynska 等人（2018）定期检查参与人员的 IP 地址，以此筛选重复提交的情况。

管理数据

管理数据也被用于观察数字平台就业的发生率或工人的行为表现。尽管用管理数据进行数据采集相对省力，但此类数据的使用存在明显局限。普遍存在的政策局限是管理数据通常涵盖参保人群的信息，未参保人群的信息则不包含在内。尽管管理数据在结合调查数据后可用于预测参保覆盖范围，但一般情况下无法解释未参保的原因和影响。符合条件但未领取待遇人员的信息通常不可获取。由于 DPE 从业人员的收入未达到特定阈值，因此可能无法从登记数据中加以识别²⁷。另一难题在于，税收或社保管理数据记录中一般会在个人数据记录上标注“平台型工作”或“灵活就业”，这恰恰是可以完善的地方。Abraham 等人（2018）指出，理论上有关自雇就业的税收数据可以和调查数据提供的信息构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但管理数据和调查数据预测出的结果通常不一致。Katz 和 Krueger（2019）也在研究中发现税收记录和调查预测结果之间存在差异。与线上平台合作以促进收税征收有助于完善管理数据来源，但税务登记簿中不包括收入低于征税起点的工人信息。此外，数据共享信息需征得纳税人同意，这可能会导致选择偏差。

管理数据还可以由特定平台自行收集。例如，优步公司完成了对峰时定价和人力供给（Chen & Sheldon, 2015）以及司机人口结构（Hall & Krueger, 2017）的数据采集（见上述关于由平台公司实施调查的小节内容）。公司管理数据存在的某些短板可能影响对平台从业人员的测定，比如同一个体在不同公司注

²⁶ 2019 年 8 月 ILO 针对网络平台展开了一项在线调查，调查从中国网站流量排名和百度权重选出的三大在线平台——猪八戒网、一品威客网、680 时间财富网——收集到 1,174 份样本。此外，2019 年 6-7 月 ILO 对北京地区的 711 名美团外卖骑手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详见“从灵活劳工到‘粘滞劳力’：对中国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跟踪调查”（ILO, 2020）和“中国线上数字劳工平台：工作条件、政策问题和前景展望”（ILO, 2020）

²⁷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port_of_spain/documents/presentation/wcms_304853.pdf

册可能会被重复统计。管理数据设置的目标未必有助于统计计算和对社会及工作条件的监测，对某些关键信息的数据采集可能需事先与平台公司协商，且只有在符合公司政策并征得其同意后才能进行数据

替代源和大数据

最后，经合组织着重强调利用可替代的大型数据集填补对数字平台就业及其从业人员特征的知识缺口。摩根大通研究所发布的《2018 年在线平台经济报告》（Farrell, Greig, & Hamoudi 2018）覆盖了 3,900 万的支票账户样本，其中 3,800 万笔支付来自 2012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美国 23 个州和 16 所城市的 128 个在线平台。该研究将在线平台经济划分为四类：运输和非运输行业、销售及租赁业²⁸。尽管交易记录表明 2013-2018 年在线平台经济不断发展，但其规模仍不足以取代传统的家庭收入来源。对参与在线平台经济的样本家庭而言，观测期内平台平均收入仅占其家庭总收入的 20%，其中从事租赁业的劳动者收入最高，但按照大多数标准他们不能算做平台员工。调查发现大多数平台经济参与者仅将自由职业司机作为兼职工作，与此同时，运输业从业人员的增多加剧了司机之间的竞争，平均收入随之从 2013 年的 1500 美元跌至 2018 年的 762 美元。灵活平台就业的承诺和报酬的降低导致参与在线平台经济的人员流动率极高，为赚取更多收入，20%的司机同时注册了多个在线平台（Farrell & Greig, 2016; Mishel, 2018）。这些发现为理解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复杂情况以及根据不同国情定义平台型工作的需要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全球视角来看，牛津互联网研究所提出要理解零工经济的运行方式就必须建立一种国际在线劳工指标（OLI）（Kässi & Lehdonvirta 2016）。传统的劳动力市场调查难以就不断变化的数字平台就业提供实时充足的信息，从而制约了研究人员在该主题上的研究。解决方案在于问题，Kässi 和 Lehdonvirta（2016）利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网页抓取技术展示了实时采集劳动力市场数据的方法，以此测定全球平台就业供需情况并建立在线劳工指标²⁹。这一做法可以为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更好理解技能-职位匹配机制以及线上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国际经济提供更多资源。

为什么对新就业形态和平台经济的测量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2012）第 22 条建议：成员国在设计或修订用于社会保障资料、统计数据和指标编制的概念、定义和方法时，应考虑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相关指导，特别是，凡适宜时，考虑第九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发社会保障统计数据的决议。2018 年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ICLS）明确提出完善协调劳动关系统计框架的需要，正在推进的 1 号决议强调了以中介工作³⁰为重点领域，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监测标准的重要性（ICLS, 2018）。由于对统计方法的选取进展缓慢同时又缺乏常用术语，因此数字平台就业的测量过程受阻，《决议》无疑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²⁸非运输工作包括遛狗人、上门维修等服务，销售行业指利用线上市场为产品寻找顾客的独立卖家，租赁业包括通过线上平台出租房屋、车位及其他类型资产的出租人。

²⁹更多信息详见 <http://ilabour.oii.ox.ac.uk/online-labour-index/>

³⁰包括任何数字平台就业或借助数字平台获得工作的情况

ILO 即将开展的案头审议指出，由于无法明确各项术语测量的对象，因此术语协调性的缺失将有损国家采集可靠并具备可比性数据的能力（Tinonin, 即将出版）。例如，部分统计局仅计入提供服务（完成在

ILO、欧盟与经合组织《技术专家组平台就业测量指南草案》

2019 年 9 月 IL、欧盟和经合组织联合成立平台型工作测量技术专家组，就概念和测量方法提供指导。三家组织目前正在编写数字平台就业测量指南，该指南实为具体落实《1 号决议》中相应观点的准则。技术专家组进行的概念性工作将为欧洲统计局（由统计局劳动力市场统计工作特别小组指导）计划开展的试点测试提供依据。指南将包括一项一般概念框架及相应术语，以协调参与国国家统计局的工作并根据国际经验和最佳实践提供指导。

信息来源: 关键人物访谈

线任务、拉载乘客等）的数据，其他统计局则将货物销售（如手工艺品销售网站 Etsy 等虚拟市场）或资产租赁（如租房平台“爱彼迎”）视为数字平台就业。

尽管平台型工作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仍没有形成一致定义（O'Farrell & Montagnier 2019:130）。概念和定义的差异导致各研究和各地区之间难以产生一致的预测结果。保持定义稳定以可以在不同时间内进行比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为确保分析趋势时不受干扰，第二次协同经济调查研究（COLLEEM II）在两轮调查中对平台就业人员采取了同样的定义。

采样方法的不同也会造成调查结果之间难以进行比较：使用平台公司数据库或专业调查公司建立的商业数据库（如 COLLEEM），又或通过在线发布和滚雪球的策略招募调查对象将导致不同偏差。引起差异的另一根源在于是否利用定义帮助受访者理解平台型工作的含义，如果调查使用了某种定义，则该定义可能会随实际情况出现调整。在探查是否存在平台型工作的问题中所用的术语十分重要。例如有结果表明，将问题中的受访者是否曾“主动提供”改为“提供”服务，得到的平台从业人员规模出现明显变化；对此，COLLEEM II 研究发现原因之一可能是许多在第一次调查中想成为平台从业人员的受访者很快感到失望并从平台中退出。除定义外，许多官方调查通过援引线上平台公司的名称帮助受访者理解平台型工作，但这种做法有一定几率降低调查结果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中的可比性。另一项需关注的点是问题设置是否足够广泛，以覆盖为获得次要收入偶尔承接平台工作以或偏重从主要工作中赚取收入的群体。如综述中所言，基准期的选择同样至关重要。各研究对基准期的设置包括一周、12 个月又或不设固定期限（您是否曾...），基准期越长，统计得到的间歇性平台就业案例越多。

方法不同可能会导致预测结果出现显著差异³¹，因此欧洲统计局（欧盟委员会的统计主管机构）正计划在欧盟劳动力调查（EU-LFS）中临时新增一项 DPE 模块。该模块目前正由专责小组负责研发，预计将于 2020/21 年在部分成员国投入测试。

³¹ <https://www.oecd.org/going-digital/mdt-roadmap-platform-workers.pdf>

在劳科院“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2020-2021）中融入良好实践调查

应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和人社部社会事业管理中心（社保中心）要求，ILO 在“非标准就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中启动了一项相应调查；社保中心特别将平台经济从业人员作为研究重点，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劳科院）负责此研究的实施。本节分别介绍中国关于平台产业及其就业情况的现行研究、研究局限和 ILO/劳科院/人社部的研究设计，最后将此研究与综述中关于平台从业人员调查的良好实践进行比较。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每年在其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中发布有关数字平台工作的统计数据³²，但报告重点关注技术及商业指标。包括滴滴出行、美团³³和阿里巴巴³⁴在内的多家平台企业已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定期发布企业在平台经济中的发展报告。它们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并综合数据来源，以美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服务业小店店主生活和工作洞察》为例，为掌握服务业小店店主的工作条件并提供政策建议，调查共使用了 9,342 份调查问卷。此外，美团研究院还根据数据库记录发布了《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阿里巴巴和世界银行在报告《电子商务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终究电商就业的规模和收入水平进行了预测，该调查汇集了多种数据来源，其中包括来自阿里巴巴平台的微型调查和整体交易数据。

然而，关于平台经济的数据不适用于劳动统计年鉴。就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专门提供或以其名义给出的数据而言，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它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调查问卷中加入涉及平台经济反复出现的问题³⁵。然而，平台经济数据无法出现在劳动统计年鉴中。尽管各省政府和人社部一次次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方法且省与省之间的调查结果通常没有可以比对的数据。

应人社部和 ILO 要求，劳科院开展了一场部分针对性在线调查，旨在收集非标准就业形态的相关信息。问卷中的问题具体明确，包括但不限于平台经济就业。调查不仅目标与 COLLEEM II 相似，采样方法也与其相仿。首先，劳科院借助专业负责线下和线上调查方法的调查公司建立源数据库。迄今为止数据库中共包含 600 万条数据记录，分别来自此前调查的存储数据、其他在线调查公司和平台公司数据，记录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每月收入、居住城市、职业和其他信息。其中一项子集数据库层层过滤掉全日制标准从业人员、失业人员和为承接任何平台工作的退休人员。经个人同意后，调查将这些

³² <https://recordtrend.com/research-report/report-on-the-development-of-chinas-sharing-economy-in-2021-from-ministry-of-information-industry/>

³³ <https://about.meituan.com/research/home>

³⁴ <http://www.aliresearch.com/EN/index> 示例详见：《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就业机会测算》
<http://www.aliresearch.com/en/Reports/Reportsdetails?articleCode=21831>；阿里巴巴与世界银行发布的《电子商务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http://www.aliresearch.com/en/Reports/Reportsdetails?articleCode=52915780756574208>

³⁵ 第 9 页（问题）；第 29 页（解释）：http://www.stats.gov.cn/tjsj/tjzd/gjtjzd/202006/t20200619_1769484.html

数据记录中有关目标人口的信息导入样本数据库，并利用非比例分层抽样获得多组更具有代表性（包括地区代表）的 NSFE 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

根据本文综述中明确的良好实践，在问及个人是否为平台从业人员时必须要让受访者对“平台从业人员”有所了解，这有助于抵挡在法律裁决和加入或退出平台中的变化。由于法律规定的调整可能导致平台工作的定义随之发生变化，劳科院不在研究中定义平台工作的做法恰当合理，且更方便日后多次展开调查。此外，调查未询问受访者是否属于平台从业人员，从而避免了可能因术语理解上的主观差异带来的偏差。相比提供实际的平台公司名称，调查更倾向于描述平台公司提供的业务类型，这有助于推动调查结果在各省之间甚至国际上的比较。

综述指出调查中往往会出现“从业人员是否提供有效服务”的问题，即暗示从业人员已完成了相应的商务交易；相比之下，“主动提供”服务的问法无法表明交易是否完成。例如，劳科院在调查中提出“您是否开展任何与这些业务相关的工作？”，问题指向“服务的供给”而非“自愿提供服务”。此外，加拿大在其劳动力调查中询问调查对象是否曾主动提供服务（未必落实）但未提及所得收入，这表示调查中可能包含慈善服务且没有构成商业交易。当前调查证明，平台工作带来切实收入。

欧洲统计局计划在即将开展的问卷调查中综合利用基于工作（您是否将提供...作为主要工作？）和基于收入的统计法（您有多少收入来自...），称两种方法可以实现有效互补。劳科院的问卷调查同样采取了这种做法，但与法国劳动力调查（通过一系列问题筛选）筛除了将平台工作视为第二职业的受访者不同，劳科院在调查中加入基于工作的统计法，以更详细地了解调查对象的主要和次要就业形式，同时不限制将平台就业作为主要就业形式的可能。

劳动力调查中普遍会设置关于过去一个基准周内调查对象的就业状态的问题。美国在对DPE从业人员的测量中也使用了一个周的基准期，其他国家的调查则以12个月为基准（加拿大、丹麦和芬兰的劳动力调查）。基准期内的数字平台就业允许就业率关联...过去12个月的数字平台就业情况表明了人们在数字平台就业中的总体参与度，同时也反映了该类型就业的流行程度。

尽管COLLEEM I中未设定基准期（“您目前的就业状态？”、“您是否通过在线平台主动参与线上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取收入？”），但COLLEEM II中使用了开放性的基准期（您是否曾...）。劳科院的方法则更加保守——不设置任何基准期（“您是否完成...”），这一做法会低估对平台工作更长的调查结果，尤其是对于需扩大时间范围可识别出的非连续性零工工作。然而也可以说，从事平台工作的时数比其频率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劳科院调查中设置了评估平台工作时数的问题：“您每月从事平台工作的时间占当月工作时间的百分比是多少？（平台工作时间指在平台销售或提供服务所用的时间，包括实际的服务输出时间、等待时间等）”此外，调查还就平台工作的时间长度进行了预测。

调查根据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的现状设置了针对性问题，如居住地和就业地是否重合，这有助于明确国内参与平台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及其来源地。2018年的COLLEEM调查同样采集了平台从业人员的国别数据，从而识别他们是否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工作或是否来自第三国家。

总结来看，劳科院的调查模式符合在国际测量手段综述中明确的多项优良做法，为采集有关平台从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的数据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对建立关于非标就业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监测框架的贡献

本节着重介绍如何利用在“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中使用的不同工具获取相关数据和信息，推动建立非标就业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监测框架。

ILO 认为，社会保障包含所有提供现金或实物待遇保护的措施，从而避免（a）因疾病、伤残、生育、工伤、失业、年老或家庭成员死亡导致缺乏工作收入（或收入不足）；（b）无法获得或无力负担卫生医疗；（c）缺少家庭支持，特别是针对儿童和成年被抚养人；（d）一般贫困和社会排斥。中国在立法中特别明确了五项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及其现金津贴和养老保险）和一项住房公积金，此外还为贫困人口提供了低保等一系列社会救助手段，疫情期间部分失业人员获得了低保保护。为对非标就业人员的社保覆盖面进行全面彻底的评估，理论上至少应对所有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建立监测框架；就中国而言还应特别加入对住房公积金的监测，纵使它不是《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险种。此外，劳动法规定带薪病假是雇主应履行的责任，因此其落实情况也可以受到监测。劳科院的调查对社会保障采取了综合测量的方法，试图识别除社会救助和带薪病假外覆盖的一系列风险，因此可以考虑扩大调查范围，将这一为项目开展的调查作为一种全面监测工具。

下列表格中介绍了欧盟成员国在 2020 年实施的**基础（0 version）**监测框架³⁶中有关核心指标的定义。为进行比较，表格中加入了 ILO 给出的相关定义和指标准则。

表 7 社会保障绩效指标

	欧盟	ILO
法律覆盖	“对于某一特定险种（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或双亲保险）：现行立法或集体协议规定群体中的个人有权参加针对某特定险种的社会保障计划。”	某一类人口或其中特定群体依据现行立法参加的保险种类数量，可参照 ILO 在第 102 号公约中提出的 9 类社会保障项目
有效覆盖	对于某一特定险种：群体中的个人享有待遇累积的机会，且在发生相应风险的情况下具备领取待遇的能力	为某一特定情况缴纳社会保险并可在所需时领取待遇的受雇人员比重，如在达到退休年龄时领取养老金 分列：男性/女性；城镇/农村；就业状态

³⁶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38&langId=en&pubId=8358&furtherPubs=yes>

		待遇受领人数：伤残津贴；生育津贴；疾病津贴；工伤津贴等
待遇充足性	如果工人和自雇人员在参保期间发生风险，建议成员国立足本国国情，确保及时向计划成员提供充足保护，同时维持体面的生活标准并给予适当的收入替代，防止相关成员落入贫困。在评估充足性时需考虑成员国的整体社会保护体系。”	每月从每种保险/计划中领取的平均待遇
缴费权重	“建议成员国确保社保缴费与工人及自雇人员的缴费能力成正比”	缴费不会伤害低收入人群利益

信息来源：作者整理

社会保障的法律范围包括对权益条件的详细描述，例如需排除的就业人员类型、等待期的资格条件³⁷。

有效覆盖包括两项指标，第一项是对缴费者数量的测定。不满足资格条件的申领人员未必不可以在需要时领取待遇，因此重要的是评估那些切实领取待遇的人员是否受到风险影响。

通过对比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的社会保障法律（2018）与欧盟委员会关于向工人和自雇人员提供社会保护的《建议》（2019.11.8），Shoukens 等人（2018）指出：“在依据《委员会建议》采取的各类方法中，各国似乎将平台从业人员并入现行制度中，但忽略了根据平台工作的具体工作条件——本质上具有灵活性——对制度微作调整。迄今为止主要的调整方法是设立收入标准线，从而明确平台工作的相关职业特征”。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但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待遇充足性。ILO 认为全民覆盖中必然包含覆盖的充足性³⁸，同样，欧盟委员会³⁹（2018）提出“养老金充足性三角”应包含三方面内容：收入维稳、贫困预防和养老金延续。对于待遇充足性的表示，符合有关条件的工人有权依法参加相应养老金计划，通过这些计划的规定可获悉替代率水平，从而体现待遇是否充足。

符合资格的工人有权依法参与计划。但现实情况是，待遇权益累积存在的多种阻碍（工作不稳定、收入波动）可能导致工人实际无法享有与普通全职职工一样水平的待遇。如果不借助管理数据集将很难对这些内容作出评估，但遗憾的是管理数据集未必会在个人数据记录中标注非标就业和平台就业等不同类别。

³⁷ https://socialprotection-human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wcms_629864.pdf

³⁸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5517>

³⁹ 欧洲委员会. 养老金充足性报告（2018）：欧盟当前与未来养老金收入充足性（卷1）；
<https://www.eubusiness.com/topics/social/pension-adequacy-1>

表 8 根据劳科院研究、其他数据来源和建议的研究方法列出了建立监测框架可依据的数据来源，其中最后一列指出“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是否援用了这些数据。

表 8 监测框架基本绩效指标及相关数据来源

指标	来源	问题	援用？
平台及 NSFE 从业人员的特征	劳科院调查	当前主要的就业形式？（私营企业员工，自雇人员，其他类灵活就业人员） 是否为派遣？ 全职还是兼职？ 您是否执行任何与这些工作相关的活动（描述几种通过在线平台承接的任务）？ 平台工作是您主要工作还是次要工作？又或主次工作皆借助平台？ 工作过的平台公司数量	√
法律覆盖范围	法律法规	收集省级经办机构对问卷的作答结果	√
有效覆盖 及 切实领取的赔偿	劳科院调查	您目前参加哪种社会保险？ 参保需求？ 未参保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您是否遭遇工伤事故？如有，是在执行以下哪种工作时发生的？ 您如何获得的工伤事故赔偿？	√
充足性	法规条例和管理数据	替代率=理论上的待遇水平 有效替代率=研究[受对等原则影响（根据对等原则，工作时间及缴费持续的时间越长，领取的待遇越多或待遇领取期限越长）] 给付期限	管理数据中无相关信息

		管理数据？见研究	见研究 ⁴⁰ （Zhao, Li, Wang 2019）
缴费权重	劳科院调查	养老保险缴费占您收入中的比例是多少？ 您的养老保险缴费是什么水平？ 您认为当前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是否过重？	√

信息来源：作者

目前各省尚没有现成的社会保险法规汇编，研究团队向 10 个研究参与省份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要求各省根据本省有关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法规条例提供问卷所需的信息。

在调查中，对有效覆盖的衡量取决于不同制度中的缴费和未缴费人员。此外，研究还测量了参加不同社会保险的优先需求（参保意向的维度之一——大多数可供平台从业人员参加的制度基于个人意愿）。然而，未来可通过设置某些特定问题提高调查对象感知风险的能力，例如“过去 12 个月是否发生以下风险并对家庭的...造成影响？”和“下列事件是否严重影响了您家庭负担必需开支的能力”⁴¹。以待遇领取实际情况测定有效覆盖面的方法适用于职业伤害评估（您是否遭遇工伤事故？事故发生时您是在从事以下哪种工作？您如何获得的工伤赔偿？），在未来研究中可将这些扩大到其他风险领域。

调查为从国际上衡量数字平台从业人员获得的社会保护提供了启示：纳入覆盖并不一定意味着从 DPE 中获得社会保障，从业人员也可能在从事其他工作中参保。劳科院在研究中就是否存在其他次要就业形式进行了评估，但没有将参保归结为主要或次要就业的结果，因此未来调查可以完善的一个方面是明确询问调查对象是否是作为平台从业人员参保。

最后，测量待遇充足性需要借助数据集之外的特定问题，但更可靠来说，需在这一过程中利用针对各省的管理数据集。事实上，中国没有一致的缴费基数政策，决定各省缴费基数和权益条件的因素差异悬殊。为了分析基金覆盖的不同就业形式的有效替代率，Zhao, Li, Wang（2019）根据某地社保机构提供的管理数据（含所有参保人员历史缴费和待遇领取记录）进行了有效替代率测算。此外，该数据还可用于测量如不同类别工人的待遇水平和待遇领取期限。

⁴⁰ <https://ideas.repec.org/a/gam/jsusta/v11y2019i24p7196-d298355.html>

⁴¹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port_of_spain/documents/presentation/wcms_304853.pdf

总结与结论

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约占欧盟和美国劳动力的 1-2%，在中等及低收入国家却日益普遍⁴²，这一现象近年引发了统计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体来看，对 DPE 从业人员的数据采集有 4 种主要策略：

- 通过传统的大规模抽样调查识别参与平台就业的人口，
- 在线发布针对性调查，可由数字平台实施，
- 政府或平台收集的管理数据，
- 可替代数据源，如银行支票账户和网页抓取

每种策略均有优势和劣势（见表 9 总结），各国如希望理解并监测劳动力的数字平台就业情况，应综合利用传统和针对性调查、管理数据以及可替代数据源对信息进行处理后的得到结果。

抽样调查（如劳动力调查）旨在预测非标就业人员和数字平台从业（基于线上和位置）人员的规模，但可能不适用于详细了解这几种就业类型的工作性质和条件；相反，针对性调查的目的不在于结果预测，而是为了了解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工作条件。

表 9 数据收集策略概览

数据来源	优势	挑战
大规模统计调查 （劳动力调查， 家庭调查，ICT 使用情况调查）	• 预测平台就业发生率 • 识别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主要特征	• 跨国比较（缺乏国际定义） • 统计能力水平低（DPE 观测例数有限） • 不适合详细询问 DPE 从业人员的工作性质和条件 • 认知挑战（受访者可能无法充分理解 DPE 定义）
针对性调查	• 深入了解对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特征和工作条件	• 无法代表全部的劳动力或数字平台劳动力 • 选择偏差
管理数据	• 预测 DPE 发生率 • 和研究数据构成稳定的数据三角 • 观测平台的市场份额及税收/社保是否合规	• 数据不易获取 • 未必能识别平台从业人员
可替代数据（大数据，网页抓取等）	• 预测 DPE 发生率 • 观测与数字经济有关的交易 • 填补特定问题的数据空缺	• 挑战和局限取决于数据来源

信息来源：作者整理

⁴² 根据关键人物访谈和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

尽管目前中国的平台从业人员不断扩大，就业形式更加多元，劳动关系更加复杂，但尚没有形成稳健且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数据。如果缺乏合同类型、工作时数、收入水平、社保状态或平台就业工作等信息，将无法对劳动保护需求做出精准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我们建议设立一种便于实施的全面监测和政策框架并将不同工作形式纳入其中，例如考虑平台从业人员在承接平台工作的同时从事更多传统类型的工作，或在平台工作与其他工作形式之间切换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在采集兼具代表性和周期性的数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人社部合作，国家统计局可实现对关键数据的采集和连续监测，进而为与平台就业和劳动保护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权威数据支持。采取通用方法和针对性调查进行补充，从而更加详细全面、准确地描述平台就业情况。⁴³

劳科院的研究以国际良好实践为依据，为更详细查询非标就业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的工作及社会保障情况奠定了可靠的方法论基础；其次，研究融入其他数据来源和方法，共同为建立一种应对主要问题的连续监测框架提供了关键信息；最后，社保经办管理数据库中分项数据的建立，和对非标准就业形态中的工作及平台工作的标注都将显著增强监测框架的能力。

作者与致谢

本文基于由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的 Eszter Timá 博士、宫琛博士和 Franziska Gassmann 博士为中欧“提高中国社保经办服务能力，实现全民社会保障”项目撰写的一份报告。

ILO 北京局首席技术顾问 Luis Frota 在报告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劳科院费平博士、杨洋博士就中国案例提供了建议，ILO 北京局协调员周洁提供编辑支持。

多名 ILO 同事为本文提出意见帮助，包括 ILO 曼谷区域办事处社会保护高级专员 Nuno Cunha，以及来自 ILO 总部的高级统计学家 Michael Thye Frosch，社会保护部社会政策司负责人 Christina Behrendt 博士，关于包容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关系和工作条件司高级经济学家 Janine Berg 博士，以及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Uma Rani 博士。

此外，作者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世界银行社会保护高级经济学家王德文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对本文提供的鼓励和卓越见解。

⁴³受访者。

参考文献

1. Abraham, Katharine, John Haltiwanger, Kristin Sandusky, & James Spletzer. 2018. 零工经济测度: 当前认识和未解决的问题. 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国家经济研究局.
<http://www.nber.org/papers/w24950.pdf> (May 27, 2020) .
2. Aleksynska, Mariya, Anastasia Bastrakova, & Natalia Kharchenko. 2018. 乌克兰数字劳工平台工作. 日内瓦: ILO.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35370.pdf.
3. Behrendt, Christina, Quynh Anh Nguyen, & Uma Rani. 2019. ‘社会保障体系和未来工作：确保对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72 (3) : 17–41.
<https://doi.org/10.1111/issr.12212>.
4. Berg, Janine. 2016. 按需经济中的收入保障：众包调查的研究结果和政策启示. 日内瓦: ILO.
5. Berg, Janine, & Uma Rani. 2018. 数字劳工平台和未来工作. 日内瓦: ILO.
6. Brancati, Cesira Urzi 等人. 2019.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Europe: Numbers, Profiles, and Employment Status of Platform workers. 欧洲数字劳工平台：平台从业人员的数量、概况和就业状态.
http://publications.europa.eu/publication/manifestation_identifier/PUB_KJNA29810ENN
(2020.5.26) .
7. Brawley, Alice M., & Cynthia L.S. Pury. 2016. "亚马逊 MTurk 工作经历：工作满意度、人员绿动率和信息共享". 计算机和人类行为. 54: 531–46.
8. 劳工统计局. 2018. “数字型工作：临时工增补面临的新问题：月度劳工评论：美国劳工统计局”<https://www.bls.gov/opub/mlr/2018/article/electronically-mediated-work-new-questions-in-the-contingent-worker-supplement.htm> (2020.5.27) .
9. Chen, Jiu Por. 即将出版. “中国在线数字劳工平台：工作条件、前景展望和政策问题”初稿.
10. Chen, M Keith, & Michael Sheldon. 2015. 劳动力市场中的动态定价：优步平台上的峰时定价和灵活就业. 安德森, 加利福尼亚州&芝加哥, IL: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院, 芝加哥大学.
11. 英国特许人事与发展协会. 2017. 零工就业？现代经济故事. 伦敦: 英国特许人事与发展协会.
12. Difallah, Djellel, Elena Filatova, & Panos Ipeirotis. 2018.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网站工人的人口结构和动态” 第 11 届 ACM 国际互联网搜索与数据挖掘会议会刊- WSDM '18, Marina Del Rey, CA, USA: ACM Press, 135–43. <http://dl.acm.org/citation.cfm?doid=3159652.3159661>
(May 28, 2020) .

13. 欧洲委员会. 2018. 扩大对所有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社会保护所作努力的行为研究. 布鲁塞尔: 欧洲委员会出版社. <https://data.europa.eu/doi/10.2767/180611> (November 20, 2020).
14. 欧洲委员会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C_.2019.387.01.0001.01.ENG&toc=OJ:C:2019:387:TOC
15. 欧洲统计局. 2019. “关于对家庭和个人 ICT 使用情况调查的指导准则和问卷范式” <https://circabc.europa.eu/faces/jsp/extension/wai/navigation/container.jsp>.
16. Farrell, D, F Greig, & A Hamoudi. 2018. 2018 年在线平台经济. 司机、工人、卖家和出租人. 纽约: 摩根大通研究所.
17. Gupta, Neha 等. 2014. 理解印度众包工人. 诺丁汉, 英国 & 格勒诺布尔, 法国: 诺丁汉大学和施乐研究中心.
18. Hall, Jonathan V, & Alan B Krueger. 2017. “对美国优步司机合作伙伴的劳动力市场分析”: 28.
19. 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 2018. 1 号决议: 关于关于工作统计数据、就业和劳动力不足趋势的决议.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230304.pdf
20. ILO. 2017. 世界社会保护报告 (2017-2019) : 全民社会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RessourcePDF.action?id=54887>; <http://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Wiki.action?id=594>.
21. ILO. 2019. 建立社会保护体系: 国际标准和人权规定.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Ressource.action?ressource.ressourceId=54434>.
22. ILO 2020 "ILO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就业监测报告 (第三版更新) ". 4.29
23. ILO & OECD. 2020. ‘关于确保自雇人员获得更好社会保护的政策原则和选择’, 备于在 2020 年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举行的 G20 就业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日内瓦 & 巴黎: 国际劳工组织, 经合组织. http://www.ilo.ch/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dg_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2290.pdf.
24. ILO & 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 2020 亚太地区对新冠肺炎的社会保护应对措施: 迄今事例和对未来的思考.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3550.pdf
25. ILO 2021. 全球就业和社会展望 (2021) . 日内瓦: ILO.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71749.pdf
26. IMF 2018. 数字经济测度. 巴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s://www.elibrary.imf.org/view/IMF007/25936-9781498307369/25936-9781498307369/25936-9781498307369_A001.xml?language=en&redirect=true.

27. Ipeirotis, Panagiotis G. 2010.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集市” XRDS: Crossroads, The ACM Magazine for Students 17 (2) : 16–21.
28. Irani, Lilly. 2015. “数字劳工的差异和依赖性：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众包网络集市为例. 南大西洋季刊. 114 (1) : 225–34.
29. Kassi, Otto & Vili Lehdonvirta. 2016. 关于建立线上劳工指数的政策及研究工具. 牛津：牛津互联网研究所.
30. Katz, Lawrence F, & Alan B Krueger. 2019. 对美国灵活就业安排趋势的阐述. 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国家经济研究局. <http://www.nber.org/papers/w25425>.
31. OECD. 2019. 对衡量数字化转型的未来规划. 经合组织.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measur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_9789264311992-en (2020.5.26) .
32. OECD 2019b 对平台从业人员的测度.
33. OECD 2020 经合组织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应对：危机期间平台为保护从业人员采取的措施
34. O’Farrell, Rory, & Pierre Montagnier. 2020. 对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测度. 新技术、工作和就业. 35 (1) : 130–44.
35. Pesole, Annarosa 等. 2018. 从 COLLEEM 调查中看平台从业人员的数据. <https://doi.org/10.2760/742789> (May 25, 2020) .
36. 芬兰统计局. 2018. 2017 年劳动力调查报告. 赫尔辛基：芬兰统计局. https://www.stat.fi/til/tyti/2017/14/tyti_2017_14_2018-04-17_en.pdf.
37. Tinonin, Cecilia. 即将发表. 对平台就业概念、定义和测量的案头审议. 日内瓦: ILO.
38. 第二次 COLLEEM 调查结果. Urzì Brancati, M.C., Pesole, A., Fernández-Macías, E. 2020

附录

附录 1: 术语表

表 10 相关概念术语表

术语	定义
众包工作	一种特定的网络平台就业类型，由一个公司或机构将具体任务通过某种网络应用外包给非特定大众，该过程被称为‘众包’。
数字经济	利用基于网络的数字技术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买卖。
零工经济	该术语经常用于指代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的去结构化的工作安排，同时还可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在平台从事日常工作或执行单个短期任务的工人，包括在特定地点等待雇主挑选承接短期任务人员的日结劳工，以及娱乐产业中的自由职业者，例如进行单场演出或现场演唱会。
互联网工作,或‘平台就业’	互联网就业，或‘平台就业’指由互联网平台为非平台企业员工的就业人员组织或协调就业。
微就业平台	微就业平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劳工平台，该平台向公司和其他客户提供大量灵活的劳动力（一种“众包”）以完成小型任务（大多为文书工作），任务可通过使用电脑和网络连接远程完成。
在线平台	在线平台可被当作数字“位置”：用户可在这些线上空间内获取信息或进行社会或经济互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们是数字版的公众广场、社团或市场。
平台经济	本质是利用在线平台减少劳务外包与在获取临时货物和服务中产生的交易成本
数字平台就业	平台员工（或从业人员）指利用应用软件（如优步）或网站（如亚马逊土耳其站点）与客户进行匹配，从而提供服务并换取收入的个人，该类人员提供运输、编码、产品说明书撰写等覆盖广泛的服务。

信息来源：Tinonin（即将发表）

德国: 德国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调查小组调查	2020	X	完整模块	+	-
美国: 兰德-普林斯顿生活调查小组调查	2018	X	2	-	+

信息来源: 基于 Tinonin 研究 (即将发表)

表 13 用于在所选标准劳动力调查和家庭调查问卷中识别非标准形态就业、工作条件和社保覆盖情况的变量

调查	时间	目标群体	地区
欧盟收入调查 (SFS) 结构	2002, 2006, 2010, 2014 (每 4 年汇总一次微观数据)	所有类型均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员工和自雇员工, 不包括: 通过服务费或佣金获得全部薪酬、不在工资表单之列的就业人员或自雇人员; 以利润分红获取全部薪酬的人员、家庭工人、自营作业者和无偿义务帮工。	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以及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

目标:

提供有关调查对象在欧盟成员国及候选国收入的准确统一的数据, 以进行决策和研究。收入结构调查是一项大型的企业样本调查, 可就薪酬水平与职工 (性别、年龄、职业、工龄、取得的最高学历等) 及雇主 (经济活动、企业规模和位置) 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给出详细可比的信息。

相关问题包括: (M: 强制, O: 自愿选择)

1. 在企业的服务年限 (M)
2. 全职或兼职员工 (M)
3. 占全职正常工作时数的 % (保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M)
4. 雇佣合同类型 (M)
5. 员工所属本地单位的识别码 (M)
6. 雇主代员工缴纳的强制性保费和税费 (O)
7. 强制性社保缴费 (O)

调查	时间	目标群体	地区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调查（EU-SILC）	2004-2018, 横断面调查; 2005-2018, 纵向调查.	所有家庭户与其中满16岁及16岁以上的成员, 集体户和机构中的人员通常不包含在内。 每年4份数据文件：家庭登记, 家庭数据, 个人等级, 个人数据	欧盟国家, 冰岛、挪威、瑞士；其他自愿参与调查的国家

目标：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调查旨在实时收集与收入、贫困、社会排斥和生活条件相关的横断面及纵向微观数据，所收集的数据具有实时性、可比性，并覆盖多项维度。

相关问题包括：

- 1.主动求职
- 2.可开展工作
- 3.自定义的当前经济状况
- 4.就业状况
- 5.职业（ILO 国际职业标准分类-88/ -08）
- 6.每周用于主要工作的时数
- 7.作为全职员工的月数
- 8.作为兼职员工的月数
- 9.作为全职自雇人员（包括家政工人）的月数
- 10.作为兼职自雇人员（包括家政工人）的月数
- 11.合同类型
- 12.员工收入或近似现金收入
- 13.从自雇就业中获得现金津贴或造成损失
- 14.从个人养老金计划中获得的养老金
- 15.个人养老金计划中的定额养老金
- 16.养老保险待遇
- 17.遗属津贴

调查	时间	目标群体	地区
欧洲劳动力调查	按季度&年, 1983-2018	个人家庭中 15 岁及 15 岁以上的人员, 机构/集体家庭中参加义务兵役或社区服务的人员不包含在内	欧盟成员国, 英国, 欧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 (冰岛, 挪威和瑞士), 黑山共和国, 北马其顿, 塞尔维亚, 土耳其

相关问题包括:

-劳动状态

- 1.基准期内的劳动状态
- 2.职业地位
- 3.持续领取薪酬或工资
- 4.职业
- 5.监督职责
- 6.在本地单位工作的人数
- 7.开始为该雇主工作或成为自雇人员的时间 (年/月)
- 8.全职/兼职的区别
- 9.从事兼职工作的原因
- 10.工作的持久性
- 11.从事临时工作/订立限时劳动合同的原因
- 12.与临时就业机构订立合同
- 13.非正式工作/倒班工作/晚班/夜班/周末工作
- 14.每周一般工作时数
- 15.基准期内就主要工作/次要工作有偿/无偿加班

- 第二份工作

- 16.存在 1 种以上的工作或业务
- 17.职业地位
- 18.基准期内从事第二职业的工作时数

除了上述常规问题，调查每年设计一个特定模块以收集劳动力市场最新出现的问题，以此得到的信息为横断面数据。相关年份及信息可以是⁴⁴：

1. 与工作分配及时间安排相关的问题（2019）⁴⁵：

- 1.1 弹性工时（指可自主决定工作时间）
- 1.2 自主减少工作时数（1-4级，从非常容易到非常困难）
- 1.3 休假自由
- 1.4 预期工作时间的灵活性
- 1.5 是否可以在空闲时间工作
- 1.6 出勤或工时记录（自动/人工手动录入）
- 1.7 时间压力下的工作
- 1.8 工作自主性（对订单及内容的影响）
- 1.9 主要工作地点（办公室、不固定等）

2. 与自雇就业有关的问题（2017）⁴⁶

- 2.1 组织上的依赖性（影响对工时的决策）
- 2.2 自雇就业的主要原因
- 2.3 作为自雇人员面临的主要困难
- 2.4 与业务伙伴合作（与合伙人合作和/或其他自雇人员开展网络合作）
- 2.5 更偏向主要工作的职业地位

调查	时间	目标群体	地区
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调查（SWTS-ILO） ⁴⁷	2012-2015	15-29 岁的年轻人	亚美尼亚，孟加拉国，贝宁，巴西，柬埔寨，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牙买加，约旦，吉尔

⁴⁴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labour_force_survey_%E2%80%93_main_features_and_legal_basis#Main_features_of_the_EU-LFS

⁴⁵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L_.2017.340.01.0035.01.ENG

⁴⁷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ork-for-youth/WCMS_191853

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摩尔多瓦，黑山，尼泊尔，秘鲁，刚果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乌克兰，越南，西岸和加赞比亚的加沙地带

目标：

收集有关年轻人及其背景特征的劳动力市场信息，识别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需求特点。

相关问题包括：

1. 雇佣合同（临时合同、无合同或口头订立等）
2. 每周一般工作的时数
3. 更愿意通过更多工时赚取更多收入还是更少工时更少收入
4. 每周工作时间低于正常时数（检测与时间相关的不完全就业或因工时过少造成的不充分就业）
5. 就业状态
6. 待遇权益（薪酬/工资，养老金、医疗保险的领取）
7. 一年内在相同地点就业的可能性（对工作无保障的认知）

信息来源：作者



技术简报由[中欧“提高中国社保经办服务能力，实现全民社会保障”项目](#)编写

技术简报内容不代表欧盟观点



欧盟提供资金支持

⁴⁷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ork-for-youth/WCMS_191853